

論三件玉杯的年代、產地及其他相關問題

楊建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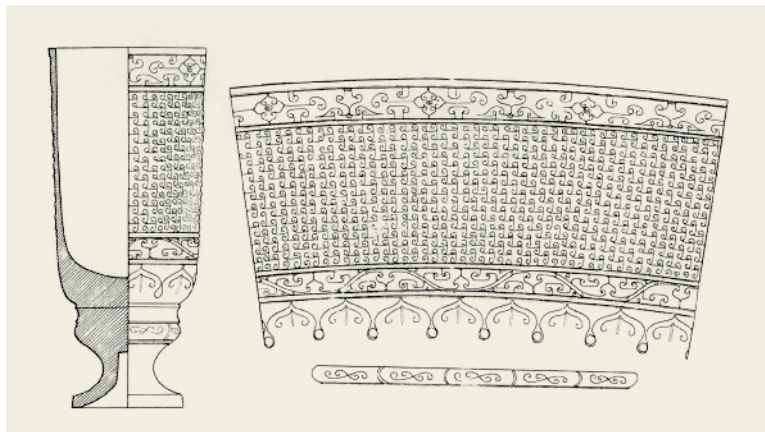
陝西西安市長安縣車劉村秦代阿房宮遺址^(註一)、廣東廣州象崗西漢南越王墓^(註二)和廣西貴縣羅泊灣西漢墓^(註三)，分別出土一件深腹玉杯。^(圖一—圖三)這三件玉杯的形制和紋飾頗為相似，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秦漢時期遺物^(註四)。近年，有學者將阿房宮遺址出土玉杯年代改定為戰國晚期^(註五)，但未說明因由。本文就這三件玉杯的年代、產地和其他相關問題，提出個人的一些看法。



圖三 戰國晚期 深腹玉杯
(廣西貴縣羅泊灣西漢墓M1)



圖一a 戰國晚期 深腹玉杯
(西安市長安縣車劉村秦阿房宮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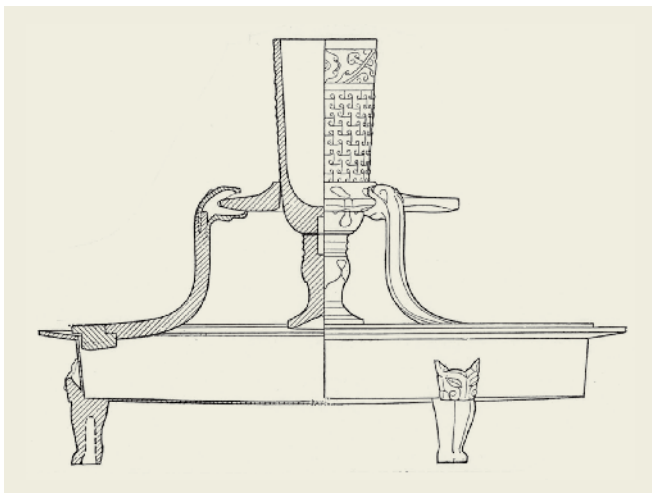
圖一b 戰國晚期 深腹玉杯 (西安市長安縣車劉村秦阿房宮遺址)

根據考古學的原理，隨葬品的年代可能與墓葬年代相當，也可能早於墓葬年代，因為有些隨葬品是墓主生前收藏的「古董」或祖先傳下來的「寶物」。這就是何以西周墓出土史前紅山文化玉豬龍、玉鳥^(註六)和山東龍山文化玉鷹虎頭飾^(註七)，春秋墓隨葬史前石家河文化玉人頭、環形人首蛇身玉飾^(註八)和紅山文化玉獸面^(註九)，以及西漢墓內發現史前石家河文化玉鷹^(註十)的緣故。所以，判定隨葬品的年代，既要考慮墓葬的時代，更主要的是就隨葬品本身的特點進行分析，從而得出結論。只有這樣處理，才能避免將墓葬年代等同隨葬品年代的簡單化方法所

論三件玉杯的年代、產地及其他相關問題



圖二a 戰國晚期 深腹玉杯（廣州象崗西漢南越王墓）



圖二b 戰國晚期 深腹玉杯（廣州象崗西漢南越王墓）



圖二c 戰國晚期 深腹玉杯（廣州象崗西漢南越王墓）

導致的錯誤。

上述三件玉杯的形制都是小口（口徑與腹徑大致相等）、直腹、高柄、喇叭口圈足。其中南越王墓玉杯還附加三瓣形的玉托架。其次，三件玉杯以勾連穀紋或勾連卷雲紋為主要裝飾。根據考古發現，這兩種紋樣流行於戰國晚期—西漢時期玉器。然則，這三件

玉杯的年代屬戰國晚期？抑或秦漢時期？甚或戰國晚期至西漢時期？二者當居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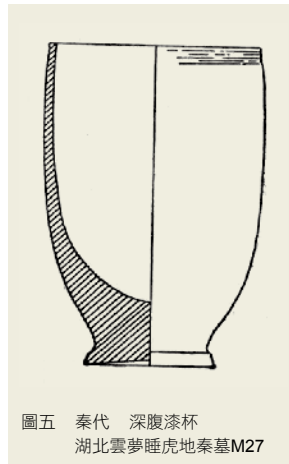
從考古發現來看，迄今出土的秦漢時期的深腹的陶杯、漆杯、滑石杯和玉杯，除江蘇盱眙東陽西漢墓M7漆杯（註十二）形制近似羅泊灣玉杯但柄粗短及實足仍有所不同之外，其餘都呈大口（口徑遠大於

腹徑）、斜直或外弧腹、短柄（或高柄）或無柄、淺喇叭口足或實足等的造型，如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M27漆杯（註十三）、房縣松嘴西漢墓M39陶杯（註十三）、湖南長沙象鼻嘴西漢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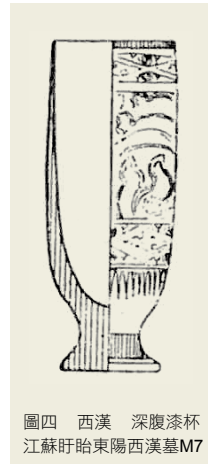
墓M1陶杯（註十四）、湘西大庸城西漢墓滑石杯（註十五）、廣州西漢墓M3023和M3024陶杯（註十六）、安徽無為甘露村西漢墓M1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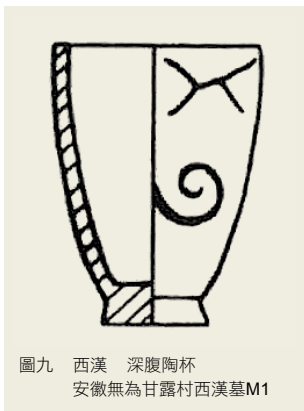
圖七 西漢 深腹陶杯 湖南長沙象鼻嘴西漢早期墓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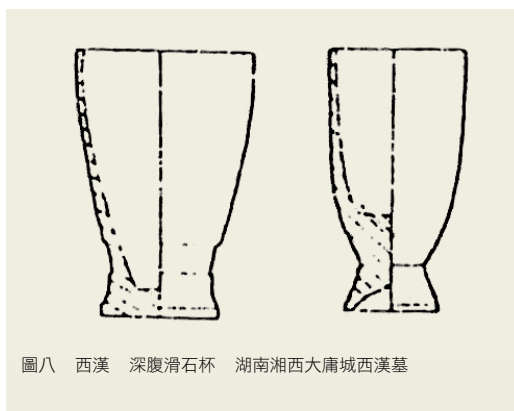
圖五 秦代 深腹漆杯
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M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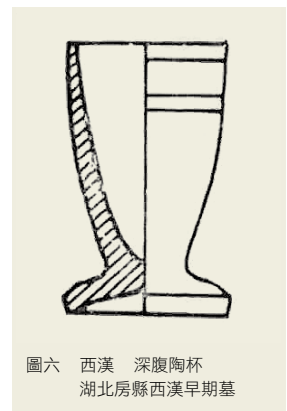
圖四 西漢 深腹漆杯
江蘇盱眙東陽西漢墓M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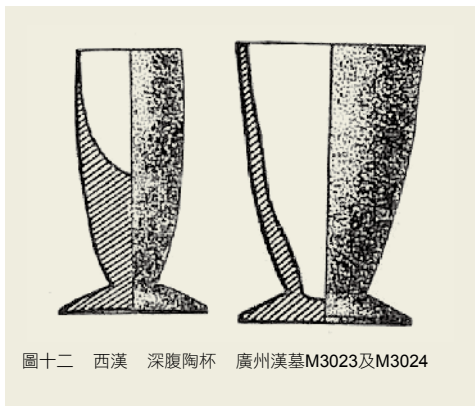
圖九 西漢 深腹陶杯
安徽無為甘露村西漢墓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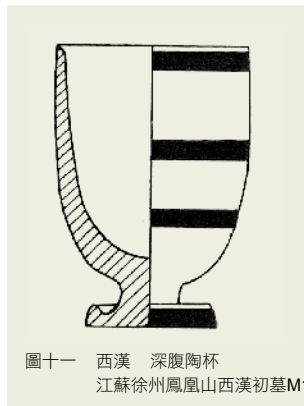
圖八 西漢 深腹滑石杯 湖南湘西大庸城西漢墓



圖六 西漢 深腹陶杯
湖北房縣西漢早期墓



圖十二 西漢 深腹陶杯 廣州漢墓M3023及M3024



圖十一 西漢 深腹陶杯
江蘇徐州鳳凰山西漢初墓M1



圖十 西漢 深腹陶杯
安徽巢湖北山頭西漢早期墓M1



圖十三 西漢 深腹玉杯
(江蘇徐州獅子山西漢早期楚王陵W1)



圖十四 西漢 深腹玉杯
(陝西咸陽西郊大泉村漢墓)

杯^(註十七)和巢湖放王崗西漢墓
之陶杯^(註十八)、江蘇徐州鳳凰
山西漢初期墓之陶杯^(註十九)、
獅子山西漢早期楚王陵玉杯<sup>(註
二十)</sup>、陝西咸陽西郊大泉村西漢
昭帝平陵附葬墓玉杯^(註二十一)等。
(圖四—圖十四)其中獅子山
和大泉村二件玉杯尤其重要，
因都是玉琢的。這些發現充分
說明秦漢時期深腹杯的流行造
型(大口、斜直或外弧腹、高
柄、短柄或無柄、淺喇叭口足
或實足)，與上舉三件玉杯的
形制明顯不同。根據這個現
象，可以肯定上舉三件玉杯的

年代不可能屬秦漢時期。也即
是說，它們應是秦漢以前的遺
物。加上以勾連穀紋或勾連卷
雲紋作主要裝飾，則它們的年
代只能是戰國晚期而不可能是
其他時期。
由以上的分析和比較，還
可知這類深腹玉杯最早出現于
戰國晚期，至漢代形制有所改
變，杯口由小口變為大口，器
身由直腹變為斜直或外弧，器
柄由高變矮。其中以口、腹的
變化最為顯著。

年代問題解決後，現在轉
過來探討產地問題。這三件深
腹玉杯雖然出自西安、廣州和
貴縣，但并不意味著它們必定
是當地所琢製。眾所周知，早
在上古時期玉器便成為朝聘禮
品，或作為賞賜物，或是戰爭
勝利者的一種擄獲物而不斷變
更其貯存地點。尤其是從春秋
時期開始，玉器成為市場上的
高檔商品，其流動性便更大。
可以說，玉器不僅可以逾代相
傳，而且隨著人們的活動還可
以穿州過縣甚至越出國境，可
說是無遠弗屆。據文獻記載，
著名的和氏璧琢造於南方的楚
國，後來流傳至北方的趙國，

最終入於西方的秦國，先後多次輾轉收藏。根據考古發現，江蘇南部良渚文化晚期的高身玉琮，居然在千里以外的四川成都金沙村商末西周初遺址中出現^{〔註三二〕}，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鷹首玉筭和玉虎頭也在極其遙遠的陝西北部神木石峁被收集到^{〔註三三〕}。這些都是典型的判定玉器的產地，未必是正確的作法。我們認為判定出土玉器的產地，其出土地區固應考慮，而更重要的是究明出土玉器本身的特點（器類、雕工、形制、紋飾等）。中國古玉研究表明，歷時悠久、分佈廣泛和內涵豐富的玉文化，在時間發展和空間分布方面，通常都會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也就是世人常說的分期和地區族屬特點^{〔註三四〕}。這些地區族屬特點是確定玉器產地的重要依據。

阿房宮遺址玉杯雖然出自秦國都城，但其紋飾的種類和

風格強烈顯示其並非秦式玉器^{〔註三五〕}。這就排除了在秦地琢造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玉杯外表面最上端一圈裝飾中的四瓣柿蒂紋、圓首尖鈎紋（抽象鳳紋）、簡化花朵紋（在兩個圓首尖鈎紋之間）和一字形簡化綉索紋（在花朵紋之上的倒置雙鈎T字紋中間上端），以及器腹下端表面的連續桃心形紋（也可稱為柿蒂紋）和器柄上的簡化鳳紋（大小S紋斜疊），都是典型的戰國楚式玉雕紋樣^{〔註三六〕}。如此眾多的楚式玉雕紋樣集於一器，其為楚器實無可置疑。故可肯定此器當在楚地製作。

南越王墓玉杯其器腹上下端和柄部及托架上的桃心形紋（柿蒂紋），如上所述是楚式玉雕紋樣。器腹中段的勾連卷雲紋與阿房宮遺址玉杯上的勾連卷雲紋雷同，都是戰國晚期楚式玉器常見的紋飾。

羅泊灣漢墓玉杯表面中段

的勾連穀紋為三聯穀紋。這種紋樣極富特色，迄今只見于楚式玉器^{〔註三七〕}。

此外，南越王墓和羅泊灣漢墓玉杯，其外表面裝飾構圖的「三段式」手法，也與阿房宮遺址玉杯大致相同：主要紋樣為勾連卷雲紋或勾連穀紋，位於中段，覆蓋面積最寬；上下兩端分別是一圈較狹的幾何形圖案作為邊飾。

以上對紋飾的分析加上形制的相同（小口、直腹、高柄），可以判定南越王墓和羅泊灣漢墓玉杯，不僅是楚式玉雕而且同阿房宮遺址玉杯一樣也應是在楚地製作的。

這裡還應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上述出土深腹陶杯、漆杯、滑石杯和玉杯的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蘇，在戰國時期都屬楚國版圖。這些深腹杯不見于中原地區漢代遺址和墓葬，却在舊時的楚地製作和流行。這只能說明它們是這一帶

的特產。追根溯源，它們是戰國楚地深腹杯的延續。這也反過來說明阿房宮遺址、南越王墓和羅泊灣漢墓出土的戰國晚期楚式深腹玉杯，必然在楚地製作。

至于廣州漢墓出土深腹陶杯，這個現象並不難理解。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屬楚地的現今湖南省，早在商代和西周初期，湘江流域及其鄰近地區的土著居民屬揚越族^{〔註二八〕}。甚至到了西漢早期，長沙居民仍是「秦半蠻夷」。所謂「蠻夷」主要指越族，他們與五嶺

以南的南越族屬同一族類，在經濟文化方面互有交往和影響是很自然的。隨著這種交往，楚文化（例如楚式青銅器和玉器）也不斷輸入嶺南地區並產生影響。這就是何以廣州漢墓出現深腹陶杯的因由。

結束上面的論述之後，有必要就河南洛陽澗西區曹魏墓M2035出土的一件白玉杯和兩件傳世西漢玉杯略加討論。

洛陽曹魏墓出土玉杯為小口、直腹、短柄，通體光素^{〔註二九〕}。（圖十五）由于是在曹魏墓中發現，故一直被當作



圖十五 戰國晚期（？）深腹玉杯
（河南洛陽曹魏墓M2035）



圖十六 西漢深腹玉杯（傳世品）

三國時期玉器。然而，迄今清理的三國時期墓一直未見有其他深腹有柄杯隨葬。考慮到這件玉杯的造型極似羅泊灣漢墓玉杯，只是杯柄較矮，而與徐州獅子山西漢早期楚王陵玉杯和大泉村西漢中期玉杯以及下述兩件傳世西漢玉杯的形制差別較大，筆者認為其製作年代可能在秦漢之前。當然也不排除是三國時期仿先秦深腹玉杯的作品，不過中間相距過於久遠，這種可能性也許較小。又這件玉杯和咸陽大泉村西漢玉杯之所以素面，或因其潔白

光潤已經美觀悅目，以玉材取勝，因而如古人所說的「美玉不文（紋）」。

兩件傳世西漢玉杯，其一刊載于古玉學家蘇蒙尼的力作《魏及其以前的中國玉器》，是一件著名的玉器^{〔註二〕}。（圖十六）蘇氏在書中將其年代定為東周晚期（戰國），但最近在一篇報導玉器拍賣的文章中

則被改為西漢，却未加解釋^{〔註三〕}。這玉杯口略大並鑲錯金銅箍，腹微外弧，粗矮足，與盱眙

盱眙東陽漆杯的形制非常接近。此外，其外表面紋飾，無論構圖手法或主題紋樣（陰刻的舒展卷雲），都與上述三件戰國深腹玉杯明顯不同。故其年代改為西漢是恰當的。儘管如此，這件玉杯的紋飾仍然充分

體現出楚式玉雕的流風遺韻。例如，以綯索紋為隔欄將外表面分成多圈紋飾，以及使用桃心形紋（柿蒂紋）、一字形簡化綯索紋（作垂直隔欄）和樹葉形紋。

另一件傳世西漢玉杯是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原定漢代^{〔註三〕}。（圖十七）此杯大口、外弧腹、高柄、帶盤，基本形制似西漢深腹杯。另一方面，其外表面中段紋飾為「翻騰交錯」的「流雲」，而且「流雲」末端加飾很多短綫，這些都是西漢紋樣的特點。尚值得注意的是，其紋飾構圖仍然是「三段式」，而且上下段紋飾也以桃心形紋（柿蒂紋）為主，說明其與戰國晚期深腹玉杯有著淵源關係，也即是距戰國晚期不致太過久遠。故將其年代定為西漢則更加精確。

附記：承林繼來先生提供部分資料及將全部插圖輸入電腦，謹致謝忱。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退休教授



圖十七 西漢 深腹玉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註釋：

1. A.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西安文物精華·玉器》122頁，世界圖書出版公司，西安，2004年。
B. 劉雲輝：《陝西出土東周玉器》219-222頁，文物出版社/眾志美術出版社，北京，2006年。
2.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203頁，圖一三二，彩版十七：1，文物出版社，北京，1991年。
3.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54頁，彩版八。
4. 盧兆蔭：《中國玉器全集·4·秦、漢—南北朝》圖七、十九及二七，河北美術出版社，石家莊，1993年。
5. 見註1之B，219-222頁。
6. A. 秦曙光、董濤：〈虢國墓出土玉器概況及所出紅山玉器〉，《海峽兩岸古玉學會會議論文專輯》(I)，491-493頁，臺北，2001年。
B. 孫秉君等：〈神祕奢華的國君夫人墓—陝西韓城梁帶村26號墓發掘記略〉，《文物天地》2006年10期87頁，左上圖。
7. 林繼來：〈山東濟陽劉臺子西周墓的史前先遺玉〉，《東南文化》2002年3期77-80頁。
8. 林繼來：〈論春秋黃君孟夫婦墓出土玉器〉，《玉文化論叢1》8-14頁，文物出版社/眾志美術出版社，北京，2006年。
9. 鳳翔縣博物館：〈陝西鳳翔縣上郭店村出土的春秋時期文物〉，《考古與文物》2005年1期3頁，圖一：7。
10. 楊建芳：〈一件珍貴的石家河文化殘玉鷹〉，《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上冊)，68-69頁，眾志美術出版社，臺北，2001年。
11. 南京博物院：〈江蘇盱眙東陽漢墓〉，《考古》1979年5期417頁，圖五：5。
12. 湖北省博物館：〈1978年雲夢秦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6年4期496頁，圖十九：4。
1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1987年湖北房縣松嘴戰國兩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2年2期，236頁，圖十一：3。
14. 湖南省博物館：〈長沙象鼻嘴一號西漢墓〉，《考古學報》1981年1期125-126頁，圖版二十：1。
15. 傅舉有：〈中國古代的滑石藝術〉，《中國文物世界》112期(1994年12月)，59頁，圖六十五(中圖)。
16.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州漢墓》274頁，圖一六二：2-3，文物出版社，北京，1981年。
17. 無為縣文物管理所：〈安徽無為縣甘露村西漢墓的清理〉，《考古》2005年5期41頁，圖五：5。
18. 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巢湖漢墓》132頁，圖九七：4，文物出版社，北京，2007年。
19. 徐州博物館：〈江蘇徐州市鳳凰山西漢墓的發掘〉，《考古》2007年4期41頁，圖十一：2。
20. 獅子山楚王陵考古發掘隊：〈徐州獅子山楚王陵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8期17頁，彩色插頁貳：1。
21. 劉雲輝：《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4·陝西》155頁，科學出版社，北京，2005年。
2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玉器》40-41頁，科學出版社，北京，2006年。
23. A. 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考古與文物》1988年5-6合期242頁，圖版肆：1。
B. 戴應新：〈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探索—完結篇〉，《故宮文物月刊》11卷10期75-76頁，圖一四九、一五〇、一五一。
24. 楊建芳：〈區系類型原理與中國古玉研究—從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談起〉，《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下冊)220-228頁，眾志美術出版社，臺北，2001年。
25. A. 楊建芳：〈春秋秦式玉雕及其相關問題〉，《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上)，222-230頁，眾志美術出版社，臺北，2001年。
B. 劉雲輝：〈西漢墓葬中出土的秦式玉器〉，《陝西出土東周玉器》附錄一。
26. A. 楊建芳：〈楚式玉器的特點〉，《玉文化論叢1》119、123、126頁，文物出版社/眾志美術出版社，北京2006年。
B. 廖決修：〈從雙鳳紋至柿蒂紋〉，《玉文化論叢1》179-206頁，文物出版社/眾志美術出版社，北京，2006年。
27. 見註26之A，124頁。
28. A. 曹學群：〈論湖廣地區的越文化與揚越的關係〉，《東南文化》1993年1期215-219頁。
B. 高至喜：〈論湖南出土的西周銅器〉，《江漢考古》1984年3期65頁。
29. A.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曹魏正始八年墓發掘報告〉，《考古》1989年4期318頁，圖版肆：6。
B.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出土文物集粹》76頁，圖版59，朝華出版社，北京，1990年。
30. Alfred Salmory, *Chinese Jade Through the Wei Dynasty*,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New York, 1963, pl. XV: 2.
31. 殷志強：〈中國玉器進入“玉無價”時代〉，《文物天地》2007年1期11頁。
32. 錢伊平：〈漢玉杯〉，《故宮文物月刊》9卷4期28頁。